心理科学进展 2009, Vol. 17, No. 3, 579–587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灾区民众的公正观与幸福感及其与非灾区的比较

吴胜涛[1,2] 王 力[1,2] 周明洁[1,2] 王文忠[1,2,3] 张建新[1,2]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成都），北京 100101）

摘 要 作为公德的社会公正与作为私情的个人幸福，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两个方面，二者在逻辑上是统一的，以往的心理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在低标准下，二者却可能出现分离。本研究探讨了灾区民众的公正观和幸福感及其与非灾区的对比，以及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二者的关系。本研究发现，与非灾区相比，处在灾区的民众持有更高的公正观与更平和的情感状态，男性尤其如此，并且其情感幸福对公正观有微弱的正向预测（主要是积极情感），但八个月后随着公正观与幸福感的回落，这种关联变得不显著。民众的情感幸福与公正观在常态下表现为分离的关系，但生活满意度这一幸福感的认知因素却与公正观一直有正向的关联。总之，情感幸福、认知幸福与社会认知的矛盾、变换关系，暗示了建立在私情基础之上的、在灾难中不断强化的中国人特定的情感与理性诉求。

关键词 公正观；幸福感；情感；理性；灾难
分类号 B849; R395

1 前言

1.1 问题的背景

公正和幸福是人类生活的两个基本价值（赵汀阳, 2004），作为公德的社会公正与作为私情的个人幸福，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两个方面（Goñi, 1996）。它们作为社会文明、公民权利的基本指标，从古至今一直是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关注的焦点。二战以后，物质财富的单向积累所引发的社会悲剧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现象世界的主观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作为人类价值主观体验的公正观（Lerner & Miller, 1978; Cohen, 1986）与幸福感（Diener, 1984; Easterlin, 2003）自然而然进入了心理学的视野，甚至主观幸福感已经被欧美国家列为基本的国民统计指标，成为其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Cummins, Eckersley, Pallant, van Vugt, & Misajon, 2003; Diener, 2000; White, 2007）。

1.2 灾难对人们公正观、幸福感的影响

公正观是一种“世界公正合理，人们各得其所”的信念，是个体主观上与社会签订的一项私人契约（Personal Contract），它使人们相信世界是稳定、有序的，从而愿意树立长远的人生目标（Lerner, 1965; Sinclair & Bourne, 1998; Dalbert, 1999; Furnham, 2003）。公正观在应对创伤事件的过程中可作为一种应付机制发挥积极的作用（Calhoun, Cann, Tedeschi, & McMillan, 1998; Sinclair & Bourne, 1998），甚至也是一种应对生活挑战的个体资源（Dalbert, 2001; Ritter, Benson, & Synder, 1990）。灾难的突然降临让个体顷刻坠入自身无力回天、任由环境摆布的状态，此时社会能否做出公正、合理的安排，既关乎身家性命的存亡，也关乎社会成员的自信与互信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生活重建；关于灾难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人们在灾难过后容易出现认知图式与客观环境的不一致，如去怀疑自己的运气不够好、世界不够公正（Solomon, Iancu, & Tyano, 1997）。此时，公正观可以作为“减震器”（Buffer）为个体提供应对危机事件的心理资源（Dalbert, 1998; Hafer, 2000），也可以作为一种“契约”为个体提供心理上的补偿（Otto et al., 2006）。

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状态，幸福即较多的积极体验与较少的消极体验，是个体自身适应社会良好与否的重要心理指标（Diener, Sapyta, & Suh, 1998）。它起初被认为是一种复合的情感，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两个独立的维度构成（Bradburn, 1969; Diener, 1984; Diener, et al., 1995），后来又增加

收稿日期：2008-11-28
通讯作者：张建新，E-mail: zhangjx@psych.ac.cn
王文忠，E-mail: wangwz@psych.ac.cn

了生活满意度这一认知成分（Andrew & Withey, 1976; Lucas, et al., 1996; Diener, et al., 1999），二者分别对应于情感幸福和认知幸福。研究显示，灾难给人造成的冲击会波及精神世界的完整性，甚至让个体丧失幸福生活的基础及人的尊严（如家园毁损、亲人伤亡、衣食无着），但灾难同时也会促使个体重新反思生命的意义，并伴随较多的积极体验和较少的消极体验，如感到友好、充实，而不是敌意、失落（Joseph, Williams, & Yule, 1993; Vázqueza, Cervellónb, Pérez-Sales, Vidalesd, & Gaborit, 2005）。

世界上每天都有灾难发生，处于灾难之中和之外的人们对公正、幸福的感受是否存在着区别？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并不多（Ballas & Dorling, 2007; Freedy, Saladin, Kilpatrick, Resnick, & Saunders, 1994; Freedy et al., 1992；Solomon, Iancu, & Tyano, 1997）。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这样的历史对中国人的社会理念与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邓拓，1937；任不寐，2000）；2008 年，灾难再次席卷中国，尤其 5·12 大地震的发生，使“天府之国”四川的社会秩序顷刻间陷入瘫痪，民众生活无以为继。在灾难的背景下，人们如何理解公正和幸福，将关系到灾区社会、生活的合理重建。本研究将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灾区民众的公正观和幸福感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1.3 中国文化下的公正观与幸福感的关系

西方的理论认为，公正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二者有着逻辑上的关联（Kamtekar, 2001）；不公正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Alesina, Tella, & MacCulloch, 2004; Graham & Felton, 2006）。就主观感受而言，个体持有较高的公正观，就意味着他有较高的幸福感，这已经得到了众多研究的证实（Dalbert, 1998, 1999; Dzuka & Dalbert, 2006）。反过来，包含情感因素的幸福感对作为社会认知的公正观也可能有一定的预测作用（Isen, 1984; Frijda, Manstead, & Bem, 2000）；关于社会公正判断的实验研究也从侧面提示我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社会公正判断更容易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Bos, 2003）。然而，幸福只是由于人们自身的缘故而想要做或想拥有的东西，说某人追求幸福并没有表明他接受了社会公正的约束（罗尔斯, 1971）。因此，有较高的幸福感，却并不一定意味有较高的公正观，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公正的幸福也是可能的。

就西方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而言，过于强调个体幸福、忽视社会公正的幸福感是一种不现实的乐观主义，甚至会导致幸福本身的消解（Taylor & Brown, 1988）。但中国传统社会对属于私情的个人“幸福”有着近乎图腾般的现实强调（王达人, 2007a, 2007b）和宗教美化（Zhang & Veenhoven, 2008），又在表达形式上要求人们保持“乐感”，抑制“悲感”（王富仁, 2001a, 2001b）；至于属于公德的“公正”，则相对被忽视，如，坚持“正义”的墨家学说一直未能进入主流意识形态（费孝通, 1949; 袁祖社, 2007）。

因此，中国人在重大的社会变迁以及自然灾害背景下，如何理解幸福及其与公正的关系？这既是中国文化应对危难的反映，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中国人是否更容易从个体幸福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公正，或者中国人的幸福感能否相对独立于他们的公正观呢？

1.4 公正观与幸福感的测量

公正观通常采用公正观量表（Belief in A Just World）进行问卷测量，但该量表一直存在多维还是单维之争（Hyland & Dann, 1987; 杜建政，祝振兵, 2007）。具有 6 个题目的一般公正观量表（Dalbert, 2000）是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工具。

主观幸福感一般采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与生活满意度量表来测量。而中国的心理学家大多采用西方的测量工具，虽然也有根据中国人对幸福的独特理解编制的中国人幸福感量表，但并未被普遍采用（邢占军, 2002）。采用西方的测量工具通常得出东方人的幸福感比西方人低的结果（Diener, Suh, Smith, & Shao, 1995），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计算总体幸福感时采用了“积极情感 - 消极情感 + 生活满意度”的计算方法，忽视了东方人对低激发积极情感（如“平静”，而不是“兴奋”）的文化偏好（Tsai, Louie, Chen, & Uchida, 2007） 及在积极词汇上的谦虚表达（刘萃侠, 2001）造成的积极情感的低分。一些本土心理学家认为，如果在和谐、安适、无欲、清静的幸福生活的标准之上编制的安适幸福感量表，则施测结果中国人要比美国人的幸福感更高（Lu, 2001; 李怡真，林以正, 2008; 杨中芳, 2008b）。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1）鉴于灾难对人们公正观与幸福感的冲击（Galea, Nandi, & Vlahov, 2005; Otto, Boos, Dalbert, Schöps, & Hoyer, 2006; Spurrell & McFarlane, 1993），本研究假设，灾区民众的公正观与主观幸福

感均低于非灾区。

2）鉴于中国人私情与公德的分离（费孝通, 1949; 袁祖社, 2007），本研究假设，被试的主观幸福感与一般公正观没有相关。

3）鉴于一般公正观作为生活信念在个体成人后就基本趋于定型（Oppenheimer, 2006）以及主观幸福感的稳定性（SUH et al., 1996; Fujita & Diener, 2005），故本研究推测，随着地震经历的逐渐远去，灾区民众的公正观和幸福感也将回归到原初水平。

2 方法

2.1 被试

来自四川地震重灾区（什邡市）、轻灾区（成都市）、飓风灾区（温州）及非灾区（北京、香港、上海、宁夏）的 1180 名被试接受了施测，有效被试 999 名，有效率 84.66%（地区、性别分布如表 1）。其中年龄最小 11 岁，最大 84 岁，平均 35.63±15.23 岁。

表 1 被试的地区、性别分布

	灾区			非灾区				灾区跟踪	合计
	什邡	成都	温州	北京	香港	上海	宁夏	什邡	
男	107	31	38	68	16	65	22	13	360
女	141	30	48	91	64	55	90	65	584
合计	250[a]	72[a]	97[a]	169[a]	86[a]	124[a]	117[a]	84[a]	999[a]

注：a 表示由于数值缺失，造成男女有效样本之和小于总样本

2.2 工具

测量公正观的工具是一般公正观量表（GBJW）。原量表由德国心理学家编制（Dalbert, 2000），中文版由吴胜涛等人（Wu & Zhang, 2009）修订。量表包括 6 个条目（如“我相信，总的来说，人们得到的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克隆巴赫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81，采用 Likert 式 1~6 点记分（1=非常不赞同，6=非常赞同）。

因为在灾区施测，工具既要简短易行，又要全面可靠，语言要切合中国实际，所以本研究最终选择的测量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包括 12 个条目的简式积极情感、消极情感词表（PANAS-S）和 5 个条目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简式情感词表由 Kahneman 等人（2004）编制，中文版由吴胜涛等人（2009）修订，采用 Likert 式 0-4 点记录被试当下的情感状态（0=一点没有，4=非常强烈）或持续情感状态（0=从不，4=总是），积极情感（如温暖、友好、自得其乐）和消极情感（如失落、愤怒、担忧、疲惫）。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 0.70 和 0.83。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由 Diener 等人（1985）编制，迄今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 150 多个国家应用过，被广泛地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Pavot & Diener, 1993a），本研究在施测时采用 Likert 式 1~6 点记分（1=非常不赞同，6=非常赞同）。

2.3 程序

1）地震发生后，研究者在提供心理援助的同时，在震后 3 个月左右，采用上述量表对地震灾区（什邡、成都）被试进行随机取样、施测，同时也对飓风灾区（温州）和部分非灾区（北京）的被试进行了施测。随后又补充了香港、上海、宁夏的非灾区样本

2）地震后 8 个月，再次对重灾区（什邡）的被试进行随机取样。除使用上述工具外，还增加了持续情感状态（词表同上）的施测。

采用 SPSS 11.5 对数据进行 *t* 检验、多元方差分析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消极情感分数的处理

鉴于中国人“不吹嘘积极、更否定消极”（刘萃侠, 2001），不同于西方人的“肯定积极、否定消极”的态度；同时也便于在同一个方向上对消极情感与积极情感进行比较，本研究将消极情感反向记分（NA´ = 4 – NA），并命名其为“平和”。即被试消极情感的原始分数越高，其平和度越低；相反，消极分数的原始分数越低，则越显得越平和。因此，本文将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分别重命名为满意、乐观（积极情感）与平和（反向消极情感）。配对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在平和维度上的得分（2.76±0.73）

与在乐观维度上的得分（1.93±0.76）存在显著差异（t=24.47, p<0.001; r=0.06, p=0.06）。

3.2 灾区与非灾区的差异比较

将以地区、性别为组间变量、年龄作为协变量，进行多元协方差分析，结果如下列各图所示。图 1a 显示，公正观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F(1,780)=37.67, p <0.001，灾区(4.25±0.05)高于非灾区(3.81±0.05)；乐观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F(1,780)=6.76, p <0.05，非灾区(2.01±0.04)显著高于灾区(1.86±0.04)；但平和与生活满意度都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图 1b 至图 1d 显示，公正观、满意、平和三个因素存在地区与性别的交互作用：灾区男性的公正观比较高，而非灾区的女性公正观比较高，F(1,780)=12.06, p<0.001；灾区男性对生活比较满意，而非灾区的女性比较满意，F(1,780)=6.84, p<0.01；灾区的男性比较平和，非灾区无性别差异，F(1,780)=6.24, p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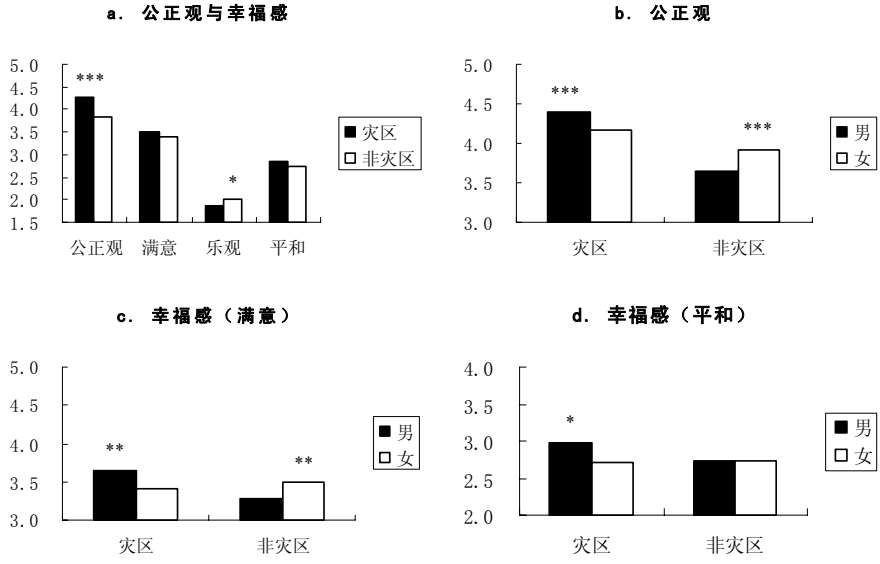

图 1 灾区与非灾区的一般公正观与幸福感差异比较

注： *p<0.05，**p<0.01，***p<0.001

3.3 幸福感对公正观的回归分析

以公正观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首先进入回归方程，再将幸福感的三个维度作为预测变量进入方程，进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各自变量的容限度在 0.76 到 0.99 之间，大于 0.10 的诊断标准（郭志刚, 1999），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灾区被试的情感幸福（乐观或积极情感）和认知幸福（满意或生活满意度）对一般公正观的预测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非灾区被试的情感幸福（乐观和平和）对一般公正观的预测均不显著，而认知幸福的预测达到显著水平（p<0.001）。此外，年龄对一般公正观亦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表 2 主观幸福感对一般公正观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群体/条件	df	ΔR^2	控制变量		预测变量		
				性别（β）	年龄（β）	满意（β）	乐观（β）	平和（β）
一般公正观（GBJW）	灾区	368	0.11***	-0.07	0.13*	0.23***	0.19***	0.01
	非灾区	415	0.20***	0.09*	-0.09*	0.45***	-0.01	0.00
	二者合并分析	784	0.14***	0.01	0.09*	0.36***	0.06	0.02

注： *p<0.05，**p<0.01，***p<0.001。

3.4 灾区民众公正观与幸福感及其关系的追踪

地震后八个月时重灾区民众的公正观与幸福感与地震后三个月比较结果（图 4）显示，灾区民众的公正观（M_8=4.31±0.67; M_3=4.49±0.83）和生活满意度（M_8=3.32±1.02, M_3=3.75±1.14）都呈下降趋势（t_1=−1.97, p<0.05; t_2=-3.05, p<0.01）。

以一般公正观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首先进入方程，然后分别将当下主观幸福感（满意、乐观、平和）和持续主观幸福感（满意、乐观、平和）作为预测变量进入方程，进行多元分层回归。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各自变量的容限度在 0.80 到 0.96 之间，大于 0.10 的诊断标准（郭志刚, 1999），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除生活满意度外，当下以及持续的情感幸福（乐观、平和）对一般公正观的预测均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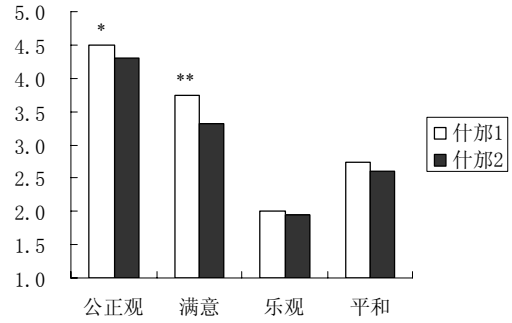

图 4 灾区民众的公正观与幸福感的跟踪比较

注：*p<0.05，**p<0.01

什邡 1 表示地震后三个月，什邡 2 表示地震后八个月。

表 4 主观幸福感对一般公正观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幸福感当下状态					幸福感持续状态				
	ΔR^2	df	满意（β）	乐观（β）	平和（β）	ΔR^2	df	满意（β）	乐观（β）	平和（β）
一般公正观	0.12*	69	0.41**	-0.07	0.00	0.16**	67	0.29*	-0.05	0.17

注：　*p<0.05，**p<0.01。

4 讨论

4.1 灾区与非灾区的比较

与非灾区相比，灾区民众的一般公正观更高，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果（Hafer, 2000）。这可能是由于灾区民众看到周围大量利他行为的发生，从而降低了灾难对公正观的威胁（Miller, 1977）。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东方人的后果思维（杨中芳, 2008b） 以及对待命运的独特方式（赵志裕, 区颖敏, 陈静, 2008）所致，灾区民众处在灾后社会限制极大环境下，更容易出现“后见之明”（Heine & Lehman, 1996），通过“存在的就是公正合理的，要主动适应”的认知，来补偿已遭受的不幸和损失（Otto et al., 2006; Otto & Schmidt, 2007）。

与非灾区相比，灾区民众的乐观和满意感较低，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Ballas & Dorling, 2007; SUH et al., 1996）。灾难给人带来心理冲击，女性受影响更甚（吴胜涛, 王力, 周明洁 等, 2009），而男性在灾后拥有更多心理资源、扮演更强大的角色（Taylor et al., 2000; Always & Smith, 1998; Cupples, 2007）。同时，灾区的男性民众表现出得更高的平和（或低消极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男人要“克制”、“镇定”、“大度”的中国文化特色。

与此同时，灾区民众表现得更加平和，消极情感较少，这同样是人们在面对灾难时的正常反应（Joseph, Williams, & Yule, 1993）。李纾等人在突发事件的风险认知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如越接近高风险阶段、越接近高风险地点，人们的心理越平静，并形象地称之为“心理台风眼”效应（梁哲 等, 2008）。

地震八个月后灾区民众的公正观和生活满意度均显著下降，也反映了人们在面对地震时的感受主要是一种应激反应。随着地震经历的逐渐远去，生活趋于正常，人们的应激反应也逐渐回落，前人的研究也证明了只有近期的生活事件才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Fujita & Diener, 2005; SUH et al., 1996）。相应的，公正观所起的应付机制作用也开始减弱；灾后重建过程中不断涌现、却又久拖不决的利害事件也开始不断威胁人们的公正信念（Hafer, 2000）。

4.2 幸福感与公正观的关系

灾区民众的情感幸福（乐观）能够显著预测一般公正观；而在非灾区人群中，这种预测则不显著。这从某个侧面暗示着，灾区民众的情感幸福与一般公正观的关系是一种应激反应（Spurrell & McFarlane, 1993），而正常的反应则似乎是二者的分离或者独立。中国人平时在思想行为上私我与公我、情与理相隔离（杨中芳, 2008a），于是在一种无法对等的差序格局（费孝通, 1949）中，就常表现出私德本位与公共精神的缺失（袁祖社, 2007）。而在突发的灾难条件下，情感幸福与公正观的出现正相关，反映了中国人自古具有的、在特殊的抗争状态下同舟共济、不分你我、情与理统一的价值实践（邓曦泽, 2008）。但是地震后八个月的时候，情感幸福与公正观的相关又消失了，这说明，当生活回归常态时，人们之间在情感上的“你与我”、“公与私”等又分离开来。这一分离、关联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个体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以低标准来安排自我与社会关系的现实（罗尔斯, 1971）。

本研究中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认知因素）与一般公正观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这暗示着，中国人的个体幸福感与社会公正观也并非完全隔离，而是通过个体对生活的认知评价，来完成私情与公理的通达。同时，幸福感的情感因素、认知因素与公正观的不同关联，也意味着包含了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更广泛的生活历程的生活满意度，与情感相比具有不同的心理机制（Pavot & Diener, 1993b; Diener, Oishi & Lucas, 2003; 池丽萍, 辛自强, 2002）。

4.3 总结

本研究发现：1）与非灾区相比，灾区民众持有更高的公正观与更平和的情感状态，男性尤其如此；并且其情感幸福——积极情感与公正观存在相关关系；2）震后八个月时民众的公正观和幸福感均有所回落，民众的情感幸福与公正观和非灾区一样，不再有相关关系。3）生活满意度这一幸福感的认知因素与公正观始终存在显著关联。这与西方研究结果略有不同，这一差异可能暗示着，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私情，中国人的价值选择具有情感优先性（蒙培元, 2003, 2008），公正更多的是一种指向社会的理性诉求（罗尔斯, 1971）。但特大灾难使中国人的情感表达与理性诉求能够较密切的关联起来，即在人们有能力独善其身时（即常态条件下），情感幸福与公正观出现分离；而在无力自保、需要社会帮忙时（即灾难条件下），情感幸福与公正观则建立起短暂关联。

致谢：感谢台湾大学的杨中芳、林以正、李怡真老师对本研究的悉心指导，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四川地震灾区及温州飓风灾区的受灾群众在数据采集过程的支持。辛玖岭、吴坎坎、王宁、钱钰、周婵、聂润秋等同学也参与了部分数据分析的工作，一并感谢。

参考文献

池丽萍, 辛自强. (2002). 幸福感: 认知与情感成分的不同影响因素. *心理发展与教育*, 18, 27–32.

邓拓. (1937). *中国救荒史*. 上海: 商务印书馆.

邓曦泽. (2008). 从《左传》看抗震救灾精神之源远流长.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7, 43–46.

杜建政, 祝振兵. (2007). 公正世界信念: 概念, 测量, 及研究热点. *心理科学进展, 15*, 373–378.

费孝通. (1949). *乡土中国*. 上海: 观察社.

郭志刚. (1999). 多元线性回归.见 郭志刚 (编),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 软件应用* (pp. 17–85).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怡真, 林以正. (2008). 安适幸福感的理论构念与测量,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2008 年年会*. 天津.

梁哲, 许洁虹, 李纾, 孙彦, 刘长江, 叶先宝. (2008). 突发公正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难题. *自然灾害学报, 17*, 25–30.

刘萃侠. (2001). 马洛 - 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对中国被试适用性之初步验证. *社会学研究*, 2, 49–57.

罗尔斯. (1971). 幸福与支配性目的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Trans.). 见 *正义论* (pp. 551–557).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蒙培元. (2003). 人是情感的存在——儒家哲学再阐释. *社会科学战线*, 2, 1–8.

蒙培元. (2008). 中国哲学中的情感理性. *哲学动态*, 3, 19 - 24.

任不寐. (2000). *灾变论——寻找另外一个中国*. Middletown: BeAuthor Press.

王达人. (2007a). 福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内涵 (下). *海内与海外*, 7, 54–56.

王达人. (2007b). 福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内涵（上）. *海内与海外*, 6, 59–61.

王富仁. (2001a).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 (上篇). *江苏社会科学*, 1, 114–125.

王富仁. (2001b).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 (下篇). *江苏社会科学*, 2, 91–103.

吴胜涛, 王力, 张建新. (2009). *灾区民众的情感表达及其与非灾区的比较*. Unpublished manuscript.

吴胜涛, 王力, 周明洁, 张建新. (2009). *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及其调节因素：灾区与非灾区的对比*. Unpublished manuscript.

邢占军. (2002). 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 *心理科学, 25*, 336–338.

杨中芳. (2008a). 研究中国人性格的一个本土框架. 见 杨宇 (编),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人格与文化* (Vol. 4, pp. 223–251).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中芳. (2008b). *中庸实践思维体系的研究进展.* Unpublished manuscript.

袁祖社. (2007). 中国传统社会的" 伦理本位" 特质与民众" 公共精神" 的缺失——立足于现代普遍主义的公共性社会信念的反思.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6*, 31–42.

赵汀阳. (2004). 道德的维度或生活的维度. 见 *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 (修订版)* (pp. 107–190).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赵志裕, 区颖敏, 陈静. (2008). 与命运议价. 见 杨宇 (编),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人格与文化* (pp. 153–161).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lesina, A., Di Tella, R., & MacCulloch, R. (2004).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 2009–2042.

Always, J., & Smith, K. (1998). Back to Normal: Gender and Disaster. *Symbolic Interaction, 21*, 175–195.

Ballas, D., & Dorling, D. (2007).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ajor life events upon happi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6*, 1244–1252.

Bos, K. V. D. (2003). On the subjective quality of social justice: The role of affect as informa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justice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482–498.

Calhoun, L., Cann, A., Tedeschi, R., & McMillan, J. (1998). Traumatic events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assumptions about a just world.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8*, 789–791.

Cohen, R. (1986). *Justice: View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Plenum Pub Corp.

Cummins, R. A., Eckersley, R., Pallant, J., van Vugt, J., & Misajon, R. (2003). Developing a National Index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Australian Unity Wellbeing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64*, 159–190.

Cupples, J. (2007). Gender and Hurricane Mitch: reconstructing subjectivities after disaster. *Disasters, 31*, 155–175.

Dalbert, C. (1997). Coping with an unjust fate: The case of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Special Issue): "Job Loss, Unemployment, and Social Injustices"*10, 175–189.

Dalbert, C. (1998).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ell-being, and coping with an unjust fate. In L. Montada & M. J. Lerner (Eds.), *Responses to victimization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p. 87–105). New York: Plenum.

Dalbert, C. (1999). The World is More Just for Me than Generally: About the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s Valid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2*, 79–98.

Dalbert, C. (2000).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questionnaire. In J. Maltby, C. A. Lewis & A. Hill (Eds.), *Commissioned reviews of 250 psychological Tests* (pp. 461–465). Lampeter, Wales: Edwin Mellen Press.

Dalbert, C. (2001). *The Justice Motive As a Personal Resource: Dealing With Challenges and Critical Life Events*: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DeNeve, K. M., & Cooper, H. (1998). The happy personality: A meta-analysis of 137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4*, 197 – 229.

Diener, E. (1984).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5*, 542–573.

Diener, E. (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34–43.

Diener, E., Emmons, R., Larsen, J.,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 71–75.

Diener, E., Sapyta, J., & Suh, E. (1998).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Essential to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Inquiry, 9*, 33–37.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 Smith, H. L.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 276–302.

Diener, E., Suh, E. M., Smith, H., & Shao, L. (1995).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reported subjective well-being: Why do they occur?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4*, 7–32.

Dzuka, J., & Dalbert, C. (2006).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old age. *Aging & Mental Health, 10*, 439–444.

Easterlin, R. A. (2003). Explaining happ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0*, 11176–11183.

Freedy, J. R., Saladin, M. E., Kilpatrick, D. G., Resnick, H. S., & Saunders, B. E. (1994). Understanding acut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ollowing natural disaster.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7*, 257–273.

Freedy, J. R., Shaw, D. L., Jarrell, M. P., & Masters, C. R. (1992).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resources stress model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5*, 441–454.

Frijda, N. H., Manstead, A. S. R., & Bem, S. (2000). Emotions and beliefs : how feelings influence thoughts (Vol. 2). Cambridge, U.K.; New York; Par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Fujita, F., & Diener, E. (2005). Life satisfaction set point: stability and 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158–164.

Furnham, A. (200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

795–817.

Galea, S., Nandi, A., & Vlahov, D. (2005). The Epidemi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fter Disasters. *Epidemiologic Reviews, 27*, 78–91.

Goñi, A. (1996). Personal project of happiness and social compromise of justice Proyecto individual de felicidad y compromiso social de justicia. *Cultura y Educación, 8*, 19–30.

Graham, C., & Felton, A. (2006).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4*, 107–122.

Hafer, C., & Correy, B. (1999). Mediator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Negative Outcom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2*, 189–204.

Hafer, C. L. (2000). Do Innocent Victims Threaten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Joum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165–173.

Hafer, C., Bègue, L., Choma, B., & Dempsey, J. (2005).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commitment to long-term deserved outcom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8, 429–444.

Hayes, N., & Joseph, S. (2003). Big 5 correlates of three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 723–727.

Heine, S., & Lehman, D. (1996). Hindsight Bias: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Japa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5*, 317–323.

Hyland, M., & Dann, P. (1987).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just world scale using british undergraduat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 73–77.

Isen, A. (1984).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affect in cognition.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3*, 179–236.

Joseph, S., Williams, R., & Yule, W. (1993). Changes in outlook following disaster: The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to assess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ponse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6*, 271–279.

Kahneman, D., Krueger, A. B., Schkade, D. A., Schwarz, N., & Stone, A. A. (2004).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Science, 306*, 1776–1780.

Kamtekar, R. (2001). Social Justice And Happiness In The Republic: Plato'S Two Principle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2*, 189 – 220.

Lerner, M. (1965).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as a function of performer's reward and attract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 355–360.

Lerner, M., & Miller, D. (1978). Just world research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Looking back and ahea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 1030–1051.

Lu, L. (2001). Understanding Happiness: A Look into the Chinese Folk Psycholog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 407–432.

Lu, L., & Gilmour, R. (2004). Culture and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individual oriented and social oriented swb.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5*, 269–291.

Lu, L., Gilmour, R., Kao, S. F., & Weng, T. (2001). Two ways to achieve happiness: When the East meets the We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0*, 1161–1174.

Lykken, D., & Tellegen, A. (1996). Happiness Is A Stochastic Phenomen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7*, 186–189.

Miller, D. (1977). Altruism and Threat to a Belief in a Just Worl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3*, 113–124.

Oppenheimer, L. (2006).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society: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9*, 655–669.

Otto, K., Boos, A., Dalbert, C., Schöps, D., & Hoyer, J. (2006). Posttraumatic symptom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f flood victims: The impact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0*, 1075–1084.

Otto, K., & Schmidt, S. (2007). Dealing with Stress in the Workplace: Compensatory Effects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uropean Psychologist, 12*, 272 – 282.

Pavot, W., & Diener, E. (1993a). Review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5*, 164–164.

Pavot, W., & Diener, E. (1993b). The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context of self-reported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8*, 1 – 20.

Peng, K., & Nisbett, R. (1999). Culture, dialectics, and reasoning about contradi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741–754.

Ritter, C., Benson, D. E., & Synder, C. (1990).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Depress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3*, 235–252.

Ryff, C. (1989).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1069–1081.

Ryff, C., & Keyes, C. (1995).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719–719.

Sinclair, C., & & Bourne, L. (1998). Cycle of blame or just world.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2*, 575–588.

Solomon, Z., Iancu, I., & Tyano, S. (1997). World Assumptions Following Disaster 1.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7*, 1785–1798.

Spurrell, M., & McFarlane, A. (1993).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coping after a natural disaster.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8*, 194–200.

Stephan, W. G., Stephan, C. W., & De Vargas, M. C. (1996).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Costa 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7*, 147 – 160.

Suh, E., Diener, E., & Fujita, F. (1996). Even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 Only recent events matt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1091–1102.

Taylor, S., & Brown, J. (1988). Illusion and well-be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 193–210.

Taylor, S., Klein, L., Lewis, B., Gruenewald, T., Gurung, R., & Updegraff, J. (2000). Biobehavioral Responses to Stress in Females: Tend-and-Befriend, Not Fight-or-Flight. *Psychological Review-New York, 107*, 411–429.

Tsai, J., Louie, J., Chen, E., & Uchida, Y. (2007). Learning What Feelings to Desire: Socialization of Ideal Affect Through Children's Storybook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17–30.

Vázqueza, C., Cervellónb, P., Pérez-Sales, P., Vidalesd, D., & Gaborit, M. (2005). Positive emotions in earthquake survivors in El Salvador (2001).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19*, 313–328.

White, A. G. (2007). A global projec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hallenge to positive psychology. *Psych-Talk, 2007*, 17–20.

Wu, S. T., Zhang, J. X. (2009). The world is more just generally than for me in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Zhang, G., & Veenhoven, R. (2008).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advice: can it help us find happiness toda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 1–19.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omparing Disaster Sites with Normal Areas

WU Sheng-Tao[1,2], WANG Li[1,2], ZHOU Ming-Jie[1,2], WANG Wen-Zhong[1,2,3], ZHANG Jian-Xin[1,2]

([1]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The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Crisis Intervention Center,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Justice and happiness are two goals of individuals as public person and private person separately, which are consistent logically and have been confirmed by some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but can be inconsistent in low standard.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GBJW)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eople in disaster sites and normal areas, and their correlates in Chinese indigenous background. The authors found that: 1) Comparing to normal areas, participants in disaster sites endorsed more GBJW and less negative affection, and there was interaction of region and gender. 2) Affective well-being (mainly positive affection) could predicted slightly GBJW in disaster sites, while it did not do in back-normal period and in normal areas. However, cognitive well-being (life satisfaction) could predicted GBJW in both conditions. In conclusion, the dialectical correlation of affective well-being, cognitive well-being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implies the special model of affective expression and rational pursuit of Chinese who lives in the private relationship and much suffering world.

Key words: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ubjective well-being; affection; rationality; disaster